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54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54 期

国际财经

被利用的通胀：财政货币互斥的政治经济学-----	1
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能维持多久？-----	3
银行与危机：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	5

国内财经

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	15
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	1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深意与挑战-----	23

新闻快讯

“稳、优”三策齐发 为市场主体解忧添力-----	26
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中国“脱钩”完全错误-----	28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	29
俄媒：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30
外媒述评：二十大将描绘中国发展路线图-----	30
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明年不乐观-----	31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被利用的通胀：财政货币互斥的政治经济学

来源：FT 中文网 (2022-10-07)

作者：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张弘硕(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重阳过后，西风渐紧，庭树叶纷纷”。在通胀高企和增长羸弱渐成常态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社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更加乱象纷呈，一系列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历史经验表明，在供给冲击引致短期“滞胀”和长期全要素生产率下行的影响下，经济问题往往难以从经济角度获得有效求解，进而使得非经济手段成为破局之需。正因为如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世界和市场，变得愈发重要。

近期，英国、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就出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斥的罕见状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当前全球新供给冲击不仅仅反映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制造业价值链的重塑上，也正在通过供给端的通胀压力传导影响总需求端的变化，并由此使得经济问题更加复杂化。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揭示的，治理长期通胀道阻且长，而在控制通胀难以一蹴而就的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也正试图利用高通胀作为谋取政治空间或经济支配权的工具。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高通胀被掺杂政治诉求，全球滞胀的求解会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波动恐将更加剧烈。

全球宏观政策的新现象：货币与财政目标开始背离。

近两周以来，全球主要央行与财政的一系列的意外操作让市场频频感到困惑。先是此前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宣布的“促增长法案”致使英国债务水平预期飙升，财政赤字预期使得市场对英国经济出现过度恐慌，尽管特拉斯政府试图纠错放弃该措施，但英镑短期内大幅波动已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显著冲击。

同时期，日本政府自 1998 年以来首次开始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连续下跌。尽管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对持续下跌的日元表示警告。但日本央行很快回应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政策基调未来 1-2 年内都不会改变。

此外，近日，美联储内部针对加息持续问题似乎出现了分歧。美联储二把手、副主席布雷纳德首次承认加息正在引起金融市场波动。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发言支持加息过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难以平衡。相比联储，美国财政部近期对控制通胀的态度保持强硬。一方面，伴随联邦基准利率的抬升，联储高额的利息支付对财政部来说正好满足其所需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财政部部长耶伦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对通胀的严重误判，如果在没有充分数据支持下，财政部调整对通胀控制的政策态度将造成财政部的公信力有所下降，这将不利于年底美国中期选举。

整体来看，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央行，其政策立场与其财政部门的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互斥，这种互斥性短期内会对金融稳定性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互斥性会不会在未来更加频繁的产生？

财政与央行政策取向互斥源于新供给冲击对需求端的不确定性影响。

探索财政与央行政策取向互斥是暂时还是持续首先需要了解这种互斥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尽管学术界对当前高通胀产生的原因仍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支持通胀高波动的持续性和强韧性既存在于长期的结构性和周期性经济矛盾，也源于外生冲击的影响（Azad & Serletis, 2022, Canuto, 2022）。

当前高通胀最直接的冲击来自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疫情前后发生的贸易博弈和乌俄冲突，加快了全球原有的贸易分工模式进一步加速瓦解，贸易链上最重要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和能源供应链正在走向重塑，叠加气候异常以及全球疫情等问题，新供给冲击导致了全球贸易成本（trade cost）和能源成本（energy cost）推高了总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最终导致通胀表现出长期的持续性和高粘性。

而在能源和制造业价值链的重塑过程中，总需求端围绕通胀这个连接供需两侧的关键锚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第一种变化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出现时间上的互斥。比如部分国家对通胀失去耐心并开始利用通胀试图追求更多的政治空间。这会导致类似于日本或英国近期出现的情况，即新上台政府无视货币政策目标利用激进的财政手段实现短期的政治诉求。

第二种变化是财政或货币政策出现空间上的互斥。比如政府通过货币及财政政策在价值链重塑（或持续的高波动中）过程中实现“套利”，或者试图追求对部分价值链（比如能源和制造业）上的更多支配权。以美国为例，高通胀对美国内部消费确实构成了一定压力，但从外部市场来说能源危机对美国能源和相关制造业带来了更多意外的好处。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更加小心权衡自身宏观政策对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在不同阶段的诉求。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也认为美联储在减缓加息和坚持加息之间的微妙平衡将会是一场斗争。

被利用的通胀：是目标也是工具。

除了英国和日本，一些国家确实正在利用高通胀以试图从中获取经济或地缘政治上的利益诉求。

具体来看，当前欧盟内部极右翼势力利用能源危机和通胀高企等问题再次掀起民族主义浪潮。意大利极右翼势力兄弟党党魁梅洛妮（Giorgia Meloni）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意大利女总理。此外，欧盟内部如匈牙利年轻民主党、法国国民联盟以及瑞典民主党等极右势力均成为能够左右本国经济重要政治力量。极右翼势力本就对欧盟走向垄断权力和经济支配力长期不满。如果奉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右势力在未来以维护民生经济为由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这将进一步与欧洲央行的加息政策取向相违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强硬表示将对试图对抗欧盟价值观的成员国进行惩罚。

我们认为，各国财政与欧央行互斥性不仅仅将加剧供需失衡，也将冲击欧洲市场的金融稳定性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财政与央行政策取向的互斥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国家通过利用高通胀来获取经济利益。当北溪 1 和 2 号管道出现人为蓄意破坏时，我们很难再去怀疑通胀已经被某些政府当作实现地缘或经济利益诉求的工具。在一个基准的假设情景下，如果俄罗斯无法和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在冬季达成和谈，预计欧洲能源短缺状况将肯定持续至明年年初。这意味着欧洲将不得不持续对美国液化天然气（LNG）产生进一步需求，叠加当前美国加息政策下的强势美元效应，出口定价权的大幅提高和价格因素促使美国能源出口企业成为了贸易链上的最大赢家。

根据最新统计，与 2021 年下半年相比，上半年美国 LNG 出口同比增长 12%，LNG 出口量达平均每

天 112 亿立方英尺，其中 70% 输送至欧洲。美国能源出口企业定价权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拉动了相关制造业和交通业的净利润攀升。9 月 FOMC 会议上美国在最新的经济预测中把明年的失业率仅仅上调修正了 0.5 个百分点，但当被问到仅上调 0.5 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是否足以将通胀带回到 2% 的目标区间时，鲍威尔则快速回避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利用需求端政策来控制供给端产生的通胀压力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利用通胀在全球地缘格局的重塑中获取政治或经济上的“定价权”或许才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真实目的。而这，也很可能变成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新原因之一。

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能维持多久？

来源：FT 中文网 (2022-10-12)

作者：沈建光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博士)

2021 年三月笔者在 FT 中文网专栏文章《2021 年美元反转及其影响》中提出“美元指数已触底反转”。今年以来，美元涨势如虹，指数创了二十余年来新高，从 2009 最低点到目前涨幅超过 50%，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最终来临。本轮美元步入超级周期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历史上美元超级周期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何种影响？本轮美元超级周期能维持多久？本文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美元超级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

2021 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从 90 左右一路飙升、高点一度逼近 115 关口，一年的上涨幅度就差不多 30%，从本轮低点有 50% 的升值。在笔者看来，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背后主要受以下三大因素驱动：

第一，通胀高企迫使美联储激进加息，美国经济韧性也超预期。尽管 9 月美联储大幅下调经济增速预测、上调失业率预测，但本轮加息周期中，美国经济基本面韧性十足。以最受关注的非农就业为例，9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 26.3 万人、超出市场预期。分项来看，教育医疗 (9.0 万)、休闲住宿 (8.3 万)、商业服务 (4.6 万) 等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同时，失业率从上月的 3.7% 降至 3.5%，处于五十余年来最低水平。总体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仍未明显改善。此外，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远低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对于美国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2009 年页岩气革命之后，美国能源消费占私人消费的比重明显下降，过去两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涨幅远低于欧洲。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实施了现代货币理论 (MMT) 政策，虽有效对冲了疫情冲击、避免了经济深陷衰退，但终究没能躲过其通胀致命伤。去年年初开始，笔者在本专栏一系列文章中如《拜登刺激新政的风险和机会》(FT 中文网 20210311) 就一直在反复提示美国本轮通胀的持续性和危险性，并坚持认为所谓“通胀暂时论”是明显误判，美联储收紧步伐明显滞后。伴随经济快速复苏，美国通胀持续升温，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持续加大紧缩力度。8 月核心 CPI 和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分别达到 6.3% 和 4.9%，“工资-通胀”螺旋上行风险不减。9 月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加息 75bp，并大幅抬高联邦基金利率预测，这也推动美国国债利率不断上升，从而带动美元升值。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 2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达到 4.3% 和 3.9%，均为十余年来新高。

第二，俄乌冲突引发能源危机，欧洲经济前景恶化，欧元受压。能源危机冲击之下，欧洲深陷“滞胀”困局。一方面，欧洲通胀水平攀升至历史新高。9 月欧元区 CPI 同比增速达到 10%，其中能源价

格同比超过40%。截至10月7日，德国天然气价格和仍接近疫情前平均水平的8-10倍；另一方面，高通胀严重制约工业生产、削弱消费信心、恶化贸易收支，欧洲经济衰退风险加大。9月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PMI进一步降至48.4%和48.8%，处于至少一年半以来的低点。德国方面，8月季调后的贸易差额仅为12亿欧元，是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9月IFO商业景气指数跌至84.3%，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不考虑2020年疫情爆发时期）。近期德国四家主要研究机构将2022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从2.7%下调至1.4%，2023年更是从3.1%大幅下调至-0.4%。

考虑到美元指数主要由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六种货币组成（欧元权重接近六成），美元兑上述币种的涨幅也可一定程度反映美国经济与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分化。据笔者测算，今年以来，美元兑欧元上涨17%，美元兑英镑上涨22%，美元兑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涨幅分别达到23%和8%，表明美元对欧洲货币的升值幅度较大；此外，美元兑日元大幅上涨27%，美元兑加元也上涨9%。

第三，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推升美元避险需求。近期持续约230天的俄乌战争呈现升级态势。自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动员以来，俄乌之间的战火愈演愈烈。10月8日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10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除此之外，9月下旬“北溪”管道再度发生泄露事件，欧洲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加剧。总体而言，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作为避险货币的美元受到追捧，对美元汇率形成支撑。

美元超级周期往往伴随危机产生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金本位制度让渡于美元本位制度的五十余年时间里，美元周期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急剧变化关系紧密。历史经验来看，美元超级升值周期往往伴随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危机产生。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并非巧合。一般而言，美元短期内大幅飙升往往面临着资金从其他市场迅速撤离，从而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具体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经历了三轮超级升值周期：

第一轮美元超级周期（1980年-1985年）：为摆脱史无前例的“大滞胀”，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强力提升利率，也将美国推向了强势美元时代。1985年3月，美元指数曾一度突破160大关，相比1980年低点上涨幅度超过90%。然而，同期全球金融市场却动荡不断，最为有名的是拉美债务危机。尽管外债过高是爆发拉美危机的内在因素，但早前弱势美元导致的资金源源涌入与美元强势回归后资金的大举撤出成为了危机的加速器，从而将拉美陷入了持续的债务危机。

第二轮美元超级周期（1995年-2001年）：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全面爆发使得1995年美元开始进入上涨周期。2001年7月，美元指数一度升破120，相比1995年低点涨幅接近50%。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同期，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也加剧了其他市场资本流出，最为著名的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彼时以泰国泰铢贬值作为导火索，金融风暴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导致亚洲各经济体经济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

2009年开始美元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前期涨势平缓，今年演变为超级周期：市场有观点认为此次美元上涨周期应从2014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后美元强势反弹开始，但我们倾向于把本轮周期的起点从2009年美元最低点算起。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抛售美元资产之声日盛，但笔者当时便提出美元已是低点，应警惕美元反转。其后伴随着金融危机蔓延至其他国家，美元有所反弹，直至美联储三轮量化放松，美元才有所走弱，但仍未跌破前期低点。2014-2016年期间，美元伴随加息预期大幅上行，再度引发了非美元汇率大幅贬值。2022年，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元大幅上行，本轮美元上涨周期最终演变为第三轮超级周期。

一旦美元步入超级周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第一轮美元超级周期造成拉丁美洲陷入债

务危机，第二轮美元超级周期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当前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正在深度冲击欧洲。叠加俄乌战争影响，欧元和英镑汇率持续贬值。9 月下旬以来，欧元兑美元持续运行在平价线之下，创 20 年来新低；9 月底，英镑兑美元一度逼近平价线，创历史最低水平，目前运行在 1.10 左右的低位。一方面，美元升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能源、食品价格更加昂贵；另一方面，欧元和英镑的大幅贬值进一步加剧欧洲通胀压力。9 月欧元区 CPI 同比已经达到两位数，高通胀影响下欧洲经济动能显著走弱，未来由“滞胀”滑向衰退已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欧洲制度层面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政治格局的不稳定，进一步弱化了未来经济前景。因此，本轮美元超级周期将加剧欧洲困难局面。此外，美联储持续加息引发全球加息浪潮。瑞典、中国香港、英国、瑞士、挪威、新西兰、澳洲、印尼、菲律宾、南非、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央行陆续宣布加息，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危机风险亦不容忽视。

展望来看，美联储激进加息、美欧经济反差以及避险需求增加三大因素依然存在，美元强势不改。短期而言，俄乌战局以及能源危机形势会影响美元兑欧元汇率，中期而言，美国经济动能何时放缓以及美国通胀压力何时缓解。笔者判断，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后美元强势才有可能扭转。

银行与危机：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22-10-11)

作者：陈永伟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比较》研究部主管)

在被称作“诺贝尔奖”的六个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立，而是瑞典银行（注：瑞典银行是瑞典的中央银行，但它在扮演央行角色的同时还兼做商业银行的业务）为了纪念诺贝尔而在 1969 年创设的，其全称叫做“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颁发给获奖者的奖金也不是来自诺贝尔的遗产，而是由瑞典银行赞助的。自这个奖项设置以来，它已经颁发了五十多次，总计奖励了八十多位在经济学各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个银行设立的奖之前却一直没有颁发过给专门研究银行问题的人。今年，这个“惯例”终于被打破了。

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中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 (Douglas Diamond) 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菲利普·戴维格 (Philip Dybvig)，以表彰他们在银行和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如果大家对银行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那就一定不会对以上三位获奖者感到陌生：伯南克曾经出任过美联储的主席，他在任时，全世界的银行都会关心他所作出的加息或减息决定；而戴蒙德和戴维格在公众当中的知名度虽然没有伯南克那么大，但他们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研究却是这个领域的基石，后续研究者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几乎绕不开他们的工作。把这一次专门奖励银行问题研究的奖颁给这三位，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看，银行究竟在经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三位诺奖得主又是怎样论述银行的作用和影响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生涯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经历？关于这些问题，且让我们一道来。

银行和银行理论简史

银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金融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

蓄等业务来承担信用中介职能。从字源意义上看,“银行”一词来自于意大利语 banco,原意是长凳、椅子。长凳是当年货币兑换商的重要经营工具,他们就是坐在长凳上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后来,banco一词被传入到了英语,拼写被调整成了 bank,词意也转成了存钱的柜子,然后才有了现在大家熟悉的银行的意思。

从上面这段字源考古,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多半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记录,历史上最早的银行是由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家族于十二世纪创立于意大利名城锡耶纳(Siena)。在当时的意大利,皮科洛米尼家族的显赫程度丝毫不亚于后来的美第奇家族,其在全欧洲的贸易,以及放贷、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领域都享有极高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家族,将手中的几类金融业务相互整合,然后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自然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鼎盛时,皮科洛米尼银行的业务网点不仅遍布意大利,而且还远达英法。遗憾的是,这个最古老的银行并没有保存下来。在1472年,锡耶纳当地出现了另一家名为锡耶纳银行(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的新银行。尽管从资历上,它难以和皮科洛米尼银行这样的百年老字号相提并论,但它却有自己的制胜法宝——吸引了教皇来入股合伙。凭借着这位股东的巨大号召力,锡耶纳银行在和皮科洛米尼银行的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兴盛了三百年的皮科洛米尼银行不得不黯然收场,而锡耶纳银行却历经了五百多年的沧桑,一直存活到了现在。

当然,即使皮科洛米尼银行没有倒闭,那它距离今天也不到九百年的历史,从金融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要知道,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借贷等金融活动已经在古巴比伦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确实算是金融行业的一个“新”发明。

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银行这个“新”发明开始受到了金融从业者们的青睐,很多从业者纷纷将老式的金融服务机构进行了改革,做起了银行的生意。这个时期,威尼斯、米兰、阿姆斯特丹、纽伦堡、汉堡等欧洲的商业中心都开出了银行,其中的很多银行也都持续经营到了现在。1694年,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向公众公开招股,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这就打破了原先只能由个人或家族来创办银行的传统,树立了股份制银行的先例。这使得后来的人们可以更容易开办银行、开展业务。随后,银行在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到今天,银行已经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金融部门——或许在美国这样股票融资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地位会略微低上那么一些,而在世界上的更多地方,银行则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枢纽。

由于银行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它从很早开始就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观察视野。总的来说,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银行在充当货币的供求中介过程当中重要性。

过去,虽然借贷关系也存在,但资金的需求方和资金的供给方之间的联系大多只能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例如亲戚、朋友之间。即使有了钱庄等旧金融机构的加持,这个范围的拓展依然是有限的。而在银行出现后,它可以在大范围内将人们手中的资金吸收进来,然后再将它们放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超大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对供求双方的撮合,使资金得到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

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做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说:“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商人不得不储存以应急需的滞财,全然是死的资财,无所利于商人自己,亦无所利于他的国家。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使这种死资财变成活资财,换言之,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于己,又有利于国。”

相比于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对于银行功能的看法是更为深刻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到:“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容易看到，在马克思看来，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就是斯密所讲的汇集资金。当然，比起斯密，马克思已经更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汇集的后果，即打破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如前所述，在银行产生前，人们在需要资金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向人借款，而在这个局部市场上，资金的持有人显然拥有垄断地位，因此可以向其索取高昂的利息。但是，在有了银行后，人们就可以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向无数身处各地的人借钱，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就这样被打破了，利率当然也会出现相应的下跌。如果大家读过悉尼·霍默（Sidney Homer）所写的《利率史》，就会看到在银行兴起后，市场的利率确实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预见性。

而马克思关于银行可以创造信用货币的见解是更具有洞察性的。所谓信用货币的创造，指的是银行可以在吸纳存款之后，将部分资金进行储配，以备不时之需，而将剩余的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超越了市场上原本的货币量，货币本体（当时是贵金属）的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信用被不断创造出来，人们从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变得更为容易。这样，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也会更为迅速，资本循环也就会更为顺畅，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与此同时，信用的创造也会给经济带去更多的不稳定，它意味着银行策略的变化将会给市场上的货币流量带来很大的冲击，而银行本身的策略是很容易受到其经营者对于市场判断的影响的。

后来，熊彼特就将这个观点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他指出在经济开始繁荣时，银行会倾向于创造更多的信用；而随着银行对未来态度的改变，就可能收紧信贷，从而导致市场上货币的紧张。正是这种收放，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从而带来了周期。而在和熊彼特差不多时间的哈耶克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哈耶克将这些观点用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以及奥派喜欢的生产结构理论进行了包装，但在这套理论中，银行扮演的角色其实一如熊彼特所言，而这些思想的渊源，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注：事实上，哈耶克本人是熟读《资本论》，甚至将其作为学生的必读文献的。这一点，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提过）。

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斯坦福大学约翰·G. 格利（J. G. Gurly）和爱德华·S. 肖（E. S. Shaw）又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一书中就银行的作用提出了区别于前面提到的“金融中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之外的第三种理论。在他们看来，银行存在的最重要价值是将直接证券转换为间接证券。这里所说的直接证券是指非金融机构如政府、工商企业乃至个人所发行或签署的公债、国库券、债券、股票、抵押契约、借款合同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票据等。而间接证券指的则是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钞票、存款、可转证存单、人寿保单、金融债券等。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证券”，比如张三买了李四价值 100 元的货物，张三的钱在银行里，没有现金，于是就可以打 100 元的欠条给李四。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守信用的，那么这个证券在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其价值就是 100 元。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不好用了。比如，如果李四欠了王五 100 元，想用这个欠条来抵债，那王五是很可能不认这个欠条的。但如果用的不是欠条，而是银行的支票就不同了。从本质上看，银行的支票是基于银行债务发行的证券，它标志着银行欠这个支票的持有人一笔钱。在张三给了李四 100 元的支票后，他很容易把它转给王五或其他人。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或私有企业发行的直接证券在使用效力上是远不如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的。因此，当人们把资金存入到了银行，本来要由其发行的直接证券就可以变成由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其流通范围和认可度都会大幅度上升。

以上这些，就是在本次诺奖的几位得主之前比较流行的银行理论。但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这些传统理论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银行地位下降论”，认为随着信息成本的降低，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已经可以越来越容易地找到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撇开银行，来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既然银行作为中介的存在意义被取消了，那么后续的信贷创造，以及将直接证券转变成间接证券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面对这样的理论质疑，银行又应该如何为自己正

名，说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呢？现在，该轮到戴蒙德和戴维格上场了。

戴蒙德和戴维格，以及他们的研究

“二戴”其人

在介绍戴蒙德和戴维格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他们的生平和经历进行一些介绍。

戴蒙德生于 1953 年。本科期间就读于布朗大学，期间，他曾短暂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加里·贝克尔的项目助理。1975 年，他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分别于 1976 年、1977 年和 1980 年获得硕士（M.A）、学术硕士（M. Phil），以及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研究。现在，他是该校布斯商学院的莫顿·米勒讲席教授（Merton H. Mi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Finance）。戴蒙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中介、流动性、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管制。在这些领域，他都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成果让其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包括 2012 年美国金融协会的摩根-斯坦利奖、2018 年的奥纳西金融奖等。

戴维格则出生于 1955 年。本科期间，他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专业为物理和数学，并于 1976 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于 1978 年获得学术硕士（M. Phil）学位、1979 年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而指导其博士论文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套利定价”理论创始人斯蒂芬·罗斯（Stephen A. Ross）教授（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诺奖遗珠”。他的理论在金融学界是有开创性的，并直接启迪了包括默顿等诺奖得主，遗憾的是他已经于 2017 年仙逝，最终未能摘得诺奖桂冠。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戴维格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介绍文章，其中很好总结了她的学术成就）。毕业之后，戴维格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从 2008 年开始，戴维格还接受了我国西南财经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教授以及金融研究院院长，直到 2021 年。也就是说，差一点点，戴维格就成了第一位在中国大学任职期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

无论是戴蒙德还是戴维格，其学术研究都有比较明显的阶段重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位学者一起在微观银行经济学，尤其是银行挤兑（bank run）问题上进行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他们的研究兴趣都发生了转移，戴蒙德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公司金融，试图从企业的角度重新审视他早期考察的一些问题，而戴维格则把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到了他导师罗斯开创的资产定价领域。所不同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戴蒙德又从流动性入手，把研究的重点重新转回了银行，并在进入新世纪后，重点研究了银行在金融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而戴维格则一直没有回归银行的研究，而是持续在资产定价领域深耕。此外，在接受了西南财大的聘请之后，他还带领那儿的学生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

鉴于此次诺奖主要是奖励几位学者关于银行的研究，因而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们将以戴蒙德的研究作为主线展开介绍。由于戴维格关于银行的研究主要是和戴蒙德合作的，因而这种叙述并不会破坏介绍的完整性。

银行究竟有什么作用？

在结束了上面这段冗长的人物介绍后，我们终于可以把故事拉回主线。如前所述，在上世纪 70 年代，质疑银行作用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那么，面对这样的质疑，究竟应该如何为银行正名呢？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引入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息经济学，从信息的角度来论证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在这个方面，首开先河的作品是勒兰德（Hayne E. Leland）和帕勒（David H. Pyle）于 1976 年发表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这篇论文只有十多页，并不算长，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是为了应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这个观点一提出，就把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从

充当中介以及创造信用转到了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而戴蒙德等人的贡献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戴蒙德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篇论文当中。第一篇是 1983 年他和戴维格合作的那篇关于挤兑问题的开创性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第二篇则是他独作的论文《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管》(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在 1983 年的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认为，银行的作用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保险。具体来说，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模型，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中，投资项目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其中产生的成本在项目完成前是不可收回的。但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投资者随时可能面临流动性的冲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终止项目，造成大量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风险事件，人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散和消除风险。但是，像投资这样的事件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当严重，保险提供者很难知道投资者的个人信息，也难以通过大样本来推断出相应的概率，因而就不可能为这种行为提供保险。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恰恰就充当了为投资人提供流动性保险的角色。当投资人面临流动性冲击时，银行的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更好地实现跨期的资源配置。而这种作用反映在宏观层面上，就可以促进经济运作效率的改善。

在 1984 年独立完成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又从另一个角度对银行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理论。他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借款人会发生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借款人一旦借到了钱，就可以用它们来为所欲为，金融合同对他们的约束能力是很低的。很显然，这样就会增大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在引入了金融中介之后，金融中介就可以作为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来监督合同的实施状况。戴蒙德用模型证明了，相比于让存款人来直接监督借款人，这可以节约巨大的成本。

通过以上两篇论文，戴蒙德就从信息角度很好地回应了“银行作用下降论”的质疑，从而为银行正了名。

如何预防银行挤兑？

虽然银行的出现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有效的流动性保险，从而帮助他们渡过流动性的危机，但银行本身其实也是脆弱而充满风险的。我们知道，虽然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钱都不是银行自己的，而是它们欠存款人的债。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这些债权人都找银行来还钱，而银行又还不出钱，那么它自己也会陷入流动性困境。在金融学上，这种现象就是“挤兑”。对于银行而言，挤兑几乎是一个梦魇。由于银行本质是逐利的，所以在吸收了存款后，它们都会将大部分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只留下小部分的准备金应对一些零星的兑付。因此，一旦大规模挤兑发生，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银行的违约甚至倒闭就几乎成了必然。

那么，挤兑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又如何对其进行预防呢？在 1983 年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挤兑的发生，其实是经济中多重均衡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每一个储户究竟是否选择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取决于他们对于银行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由其周边人的行为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没有人抢着去取钱，那就说明银行是安全的，因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取；但如果某一天，他发现大家都抢着去银行取钱，那么就说明银行出了问题，自己也必须抢着去取钱。因此，当恐慌一产生，它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过程——大家都害怕银行出事，于是银行就真的出事了。

既然挤兑问题主要源于人们对于银行的信心，那么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须打破这种恐慌的传导机制。对于这一点，戴蒙德和戴维格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在分析银行挤兑问题上，戴蒙德和戴维格论文中提出的两期分析框架非常有名，在文献中，它经常被称为 Diamond-Dyvig 模型，或 D-D 模型。后来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大量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的。

流动性问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戴蒙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动性问题的探讨上，并以此为切入，重新对银行问题展开了探讨。在这个领域，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其中，在他和拉詹合作的论文《银行资本理论》(A Theory of Bank Capital) 以及《流动性风险、流动性创造和金融脆弱性：一个银行理论》(Liquidity Capital, Liquidity Cre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A Theory of Banking) 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缺乏流动性是资产固有的属性”。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在现实中，不同的人拥有同样的一笔钱，或者一套设备，可以干出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位天才企业家拥有了一笔资产后，他可以用这笔资产去购入设备，制造出产品，然后卖很多的钱，但是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什么也干不了。但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这位企业家因为流动性困境无法生产，他购买的设备已经投入了某项专用事业，成为了所谓的专用型资产，无法转换成等额的资金，这样一来，即使企业家试图出售一部分资产来获得流动性，也是不可得的。换言之，每一笔资产一旦形成，它就是打上了其使用者的钢印的“关系专用型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它的流动性属性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帮助缓解经济中的流动性呢？这就需要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帮助了。在戴蒙德和拉詹看来，虽然很多投资项目缺钱，但其实市场上有钱的金主并不少。只是由于他们难以获得市场上的项目信息，因而不敢把钱借给那些项目运营者。而如果没人来投资项目，市场上资金缺乏，就会导致市场上运作的项目少，因而可以提供的信息更少，金主由于缺乏信息，难以对项目进行评估，就更不愿意把钱借出去。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流动性紧缺问题就出现了。这时，如果有金融中介参与其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这个死循环，成功让市场上流动性得到提升。

金融危机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戴蒙德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入到了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在这个领域，他和拉詹等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很多论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是 2001 年发表的《银行、短期贷款和金融危机：理论、政策涵义和应用》(Banks, Short-term Debt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在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是短期债务的缺乏限制。而戴蒙德则在分析后认为，短期债务在缓解亚洲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因。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投资项目的低效，以及监管的缺失。

另两篇重要的论文是 2009 年的《信贷危机：关于成因和对策的猜想》(The Credit Crisis: Conjectures about Causes and Remedies) 以及 2011 年的《恐慌性抛售、流动性缺乏，以及信贷冻结》(Fear of Fire Sales, Illiquidity Seeking and Credit Freezes)。在这两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拉詹一起对 2008 年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推动，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升。这使得美国金融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来扩大其授信范围，并通过证券化将风险打包、分割。这一方面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定价变得更为困难。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时，问题并不突出，但当房地产价格骤然下降时，潜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高层不当的激励、银行的资本结构等，都会扩大这个风险。

戴蒙德和拉詹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恐慌性抛售，以及对恐慌性抛售的恐惧是扩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企业，它们通常会有两种心思：一方面，他们对因流动性需求压力而被迫抛售资产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又期待其他银行抛售资产，这样可以用低价来获取对手的资产。在这两种心思的作用之下，每一个银行都会死死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甚至连正常的同行拆借和信贷都不提供。这样一来，市场上的流动性就整体冻结了，那些希望获得流动性的企业和银行都会因此陷入困境。本来，有一两个银行陷入困境，只要同行可以及时提供支持，那么它们就可以成功度过危机；但如果同行都见死不救，那么危机就会如星星之火，很快烧遍整个行业。最终，整个金融行业都会被恐惧笼罩。这时，所有的银行都会争相抛售资产，这种恐惧性的抛售会让资产价值急速跳水，市场上的银行也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一旦危机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不能仅依靠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来实现自救了。而这时，也就到了让伯南克这样的金融“救火队员”上场的时间。

伯南克及其研究

伯南克其人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 年 12 月 13 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伯南克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曾在纽约经营着多家药店，但由于大萧条的到来，他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41 年，他发现狄龙地区有一家药店出售，就带着自己的妻儿一起逃离了纽约，搬到了狄龙。伯南克的父亲菲利普·伯南克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但讽刺的是，这位海军战士大部分的军旅生涯却是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度过的。在那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个军用物资供应点。退役之后，菲利普去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攻读戏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那儿结识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埃德娜。很快，菲利普与埃德娜坠入了爱河，并一起回到了狄龙的老家。不久之后，他们的孩子伯南克就出生了。

从很小开始，伯南克就体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小学六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拼字比赛，一举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冠军——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一个单词中多拼了一个字母，他就是当年全美国的冠军。

伯南克在哈佛度过了自己的本科生活，并于 1975 年从那儿毕业。在此之后，他进入了哈佛边上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在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宏观经济理论。伯南克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大萧条，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话题。

1979 年，伯南克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了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 1983 年升为副教授。在斯坦福期间，伯南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萧条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认为相比于货币供给的下降，金融系统的失灵是造成大萧条的更本质原因。1985 年，伯南克跳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在那里，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一起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BGG 模型。从 1996 年开始，伯南克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在任职期间，伯南克礼贤下士，招来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充实了经济系的科研和教学实力。例如，经济学界著名的“大嘴”，2008 年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伯南克任职期间力排众议引进的，而他在伯南克任职美联储期间，却成了其最坚定的批评者。

2002 年，伯南克被布什总统提名进入了美联储，担任理事。2006 年，他又接替了传奇人物格林斯潘出任了美联储主席，直到 2014 年。卸任后，伯南克进入了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现在，他是该学会的杰出研究员。

从大萧条到“金融加速器”

在学术研究上，伯南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 1929 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二是对“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探讨。

在宏观经济学中，对大萧条的解释一直被视为是“圣杯”（grail）。在伯南克之前，已经有很多著名学者对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大萧条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关于这一观点，最著名的论著当属凯恩斯本人的《通论》。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大萧条源于货币供应量的崩溃。在《美国货币史》当中，弗里德曼曾对这个观点进行过深入的阐述。

在一定程度上，伯南克对大萧条的解释可以被认为是上述观点的综合。和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类似，伯南克认为大萧条的发生确实是源于流动性的紧缩，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当时存在的金本位制度。在他看来，正是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黄金盈余国对黄金流入进行冲销，从而引发了货币的收紧。而这种货币的紧缩又通过金本位制度传导到了整个世界。在其著作《大萧条》中，伯南克援引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越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从大萧条中复苏越快，从而反证了金本位制度的存在乃是大萧条的根源。当然，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讨论了供给因素的影响。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工资刚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巨大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名义工资，而这显然会造成更多失业，让大萧条持续更久。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大萧条的深入研究，伯南克比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 1983 年的论文《大萧条宣传中金融危机的非货币效应》（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他就着重分析了银行倒闭对金融风险的传导作用，这个观点，其实是和戴蒙德等人的论述十分类似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伯南克的研究重心转到了更为理论化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上。

所谓金融加速器，顾名思义，就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外生冲击的放大和加强作用。在 1989 年发表的论文《代理成本、抵押品与经济波动》（Agency costs, collateral,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和他的合作者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伯南克之前，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曾提出过一个融资结构无关的理论，也就是著名的 MM 定理。根据 MM 定理，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那么企业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受到融资结构的影响，其价值也会独立于融资结构。但在伯南克和格特勒看来，这个假说显然是难以在真实世界中成立的。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因而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会高于内部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

当企业受到冲击时，其现金流和净值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本身又会进一步放大冲击的效用，影响其融资能力。然后，融资能力的进一步收紧，又会反过来继续压低企业的现金流和净值……由此，金融市场对冲击的放大效应就出现了。在伯南克看来，金融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这种放大效应就越明显。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会延长周期，造成周期的放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出现于 1989 年的论文，但它作为一个名词正式出现却是在 1996 年与格特勒，以及西蒙·吉尔切菲斯特（Simon Gilchrist）合作的论文《金融加速器与安全投资转移》（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中。此后，三位作者又在 1999 年的论文《一个数量化商业周期框架中的金融加速器》（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中对这个思想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模型表述。由于三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分别为 B、G、G，因此这个模型经常被称为是 BGG 模型。

在 BGG 模型中，金融加速器效应被融入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它清晰地告诉人们，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经济冲击是怎样通过金融市场放大的，而金融市场的效率又是如何影响金融加速器的大

小的。

除此之外，BGG 模型还为央行的干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央行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率对于实际收入的影响来实现的——当利率更低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就会更高，因而有效需求就可以更大。而考虑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后，利率对于经济的作用渠道就更多了：当利率降低时，企业的净值将会增高，这会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会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显然，这个发现对于日后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应对金融危机是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美联储里的陌生人

2002 年初的一天，正在学校办公的伯南克收到了一个来自华盛顿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他代表总统小布什询问伯南克，是否有兴趣改变一下现状，走出学校，去为美联储工作。

接到这个邀请后，伯南克很是犹豫。对于他这样一个久居象牙塔中的人来说，为联储工作将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他将远离他熟悉的教学和科研，辞掉刚刚担任不久的《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注：《美国经济评论》是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杂志，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担任该刊的主编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甚至自己的女儿都要离开她的伙伴，跟自己转学到华盛顿去。不过，作为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学以致用用的冲动最终使他说服了自己，于是他向哈伯德回复，愿意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这场“面试”进行得十分轻松愉快。在询问了伯南克几个问题后，小布什总统就认定他是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合适人选。在经过了一些例行的审核之后，小布什于 5 月正式提名了伯南克。8 月，伯南克就在格林斯潘的见证下，正式宣誓加入了美联储。

伯南克加入美联储时，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但在那段时间里，伯南克却一直过得不太开心。作为一名学者，他在更多时间里更像是美联储里的一个陌生人。

在货币大师格林斯潘操刀的货币政策之下，经济增长稳定，通货膨胀平稳，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大萧条出身的专家，对经济危机的忧虑却总是萦绕在伯南克的脑中。在对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演讲（这也是他加入联储后的第一次公众演讲）中，他表达了这个看法。他指出：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通货紧缩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依然可能出现，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联储应该对其有所应对。不久之后，他又在两次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当时的多数人对伯南克的看法不以为然。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普通人认为大萧条绝不可能重来，甚至连多数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1995 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在 2003 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经济危机的核心已经被解决了”。

2006 年，执掌美联储长达十九年的传奇人物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被任命为了美联储主席。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时期，为了刺激经济，一直采用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催生出了巨大的泡沫，这也催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又奉行放任政策，对衍生品市场上的各种创新少有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将蕴含巨大风险的次级贷款打包成各种金融产品进行出售，于是，产生于次贷市场的风险就弥漫到了整个经济当中。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铺满了火药，就等火被点燃了。

几乎就在伯南克接棒格林斯潘的同时，火被点燃了。从 2006 年的春季开始，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了下降，次贷违约现象开始出现。本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小火苗，市场自身的调节很快就能把它掐灭。不过，在各种衍生品、金融杠杆，以及戴蒙德和拉詹所说的信贷冻结和恐慌性抛售的助推之下，这个小火苗却逐步变成了燎原的大火。到了 2007 年，次贷危机已经波及了全世界，欧美股市出现了全线暴跌，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濒临倒闭。虽然造成这一

切的根源是格林斯潘在任内留下的，但在他“事了拂衣去”之后，继任的伯南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背锅侠”。

尽管伯南克一直都防备着危机，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预料到危机发生的确切方向。这当然不能怪他，事实上，在他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中，银行和金融中介只在宏观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色，即使他的 BGG 模型也经常被人认为言过其实。而在真实世界中，金融创新的发展，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象牙塔内那些学者的想象，凭借标准的经济学训练，即使能够预感到危机，也难以找到危机的位置。

幸运的是，经济学训练虽然没有让伯南克可以先知先觉，防患未然，却足以让他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面对金融市场的全线告急，流动性的迅速枯竭，他很快认识到，其实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几家关键的金融中介机构身上，正是它们的告急导致了恐慌和挤兑。因此，要想拯救整个金融市场，就必须对这些金融机构流动性，以保证它们能够在危机中挺住。在这种信念之下，他说服并带领联储人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于关键机构的救助计划。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些救助对于稳住金融市场，遏制金融风险的蔓延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帮助金融市场挺过了危机，却把伯南克本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伯南克的救市方案是针对关键金融机构，这个方案让他里外不是人——主张强干预的人认为，伯南克这种做法太过缩手缩脚，难以迅速遏制危机蔓延；而主张自由放任的人则认为，伯南克主张援助那些贪婪的大型金融机构完全是对市场的扭曲，这种做法很可能在未来助长它们的道德风险。可以想象，当时的伯南克一定面对着极为巨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他本人在制定这些救助方案时，心里就充满了挣扎。作为一名学者，他是信仰自由市场，痛恨那些利用市场牟利的金融寡头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却不得不去拯救那些自作自受的金融寡头。

危机来得很猛，但去得也比较快。不久之后，金融市场上的混乱基本结束了，但是，伯南克却并没有因此轻松。当危机过去后，接着要做的就是经济复苏。但怎么推动这一切呢？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较高的通胀率，直到经济增长和就业恢复。包括美联储副主席（同时也是后来的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芝加哥联储主席查尔斯·伊文思（Charles Evans）、纽约联储主席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在内的一众大佬都支持这种方案。不过，作为一名优秀的货币经济学家，伯南克对这种激进的方案却很犹豫。他当然知道，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更利于增长，但他也深知，通胀就像是毒品，一旦用上了就很难停下来，而这对于经济的伤害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在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之后，伯南克选择了比较中庸的道路，通过量化宽松，把通胀维持在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位置。

显然，这个方案又遭遇了大量的责难。干预派指责这过于谨小慎微了。比如，那位由伯南克亲自招入普林斯顿的“大嘴”克鲁格曼就公开在自己的博客上批判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展现出“可耻的”消极态度，而伯南克本人则被其斥为是“软骨头”。而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则批评伯南克用货币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自我调节。例如，经济史学者艾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就认为当时困扰美国的高失业率并不是货币问题，伯南克试图用货币政策去调节经济其实是在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

2010 年时，伯南克任美联储主席满一届，在参议院审议其连任申请时，得票是 70 比 30，而格林斯潘在上一次连任时，得票则是 89 比 4。两相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到这位帮助美国度过了最困难时刻的英雄到底有多么备受争议。

在第二个任期，伯南克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为了兼顾这个目标，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制定着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又仔细地评估着经济状况，以求在合适的时候退出量化宽松。然而，伯南克并没有在自己的任期内结束量化宽松。2014 年 1 月，伯南克任

期任满，在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的任务从此甩给了他的继任者耶伦。幸运的是，在伯南克卸任前，美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出现了明显好转，社会上对其的评价也开始改善。2013 年底，路透社对美国的金融分析师组织了一次调查，让他们给伯南克的任职表现打分，结果显示，在 10 分的总分中，分析师们打出的平均分为 8 分。

当伯南克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后，他终于可以回到学术界，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联储、观察经济了。他选择加入了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研究话题依然是“从大萧条中促进经济强劲复苏”。

如何面对下一次危机

现在，距离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常态。每一天，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照例吞吐着巨额的资金，为经济输送着流动性；而华尔街的精英们则和往常一样，追寻着每一个机会。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但是，这一切真的是持久的吗？岁月真的如此静好了吗？事实上，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危机的阴影从来都没有远去。疫情风险、能源危机、供应链困局、俄乌冲突……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种子，可能产生像戴蒙德和戴维格所说的那种“自我实现”效应，放大成为一次巨大的危机。

那么，在下一次危机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情况其实并不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十多年的发展，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见性。在上一次危机过去之后，虽然各国的金融体系都进行了一些修补，但从根本上讲，似乎各国都没有花心思去事先预防其中存在的真正风险。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很多新的风险点都在悄悄地生长，只需要一个契机，它们就会成为新的危机的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次警钟，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危机中学到教训，为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国内财经

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09-28)

作者：杨蔚(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1. 高质量发展是党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高质量发展是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低速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际，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也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化。2013 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2014 年提出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不只是拼速度，而是要从长久持续稳定的角度，强调内在的发展质量。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

2. 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从根本上说，高质量发展是从解决社会各方面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没有”“大不大”“足不足”转向解决“好不好”“优不优”“美不美”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注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

3. 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包括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动力高质量，经济结构、供给体系高质量，社会保障支持体系高质量，综合效益高质量等方面。它既包括社会发展链条上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成熟与否，还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和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是综合式发展。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起点，逐步跨越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渗透。它既要具有科学的发展理念、科技创新的持久动力、合理的经济结构、满足需求的有效供给体系、多样平衡的生态环境、坚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具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公平美好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已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要求，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国家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综合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的综合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整个社会平稳和谐，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能给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够产生更大福利效应的发展。

因此，高质量发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追求。高质量发展就是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对国际竞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条件下，高水平、高质量地实现人民所想、所愿、所求，这一发展目标鲜明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最初是以经济发展要求为起点，拓展到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各方面，涉及军事、科技、教育、医药卫生、社会服务等各领域各行业。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从战略高度确定历史方位、做好顶层设计。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明确新阶段发展目标

新阶段发展目标，就是指我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从现在到本世纪中

叶，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对我国社会发展全局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作用，集中体现了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要坚定不移地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不断把“蛋糕”做大，又要不断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我国作为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部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增强自身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循环畅通无阻，最本质特征是具有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资源配置的强大推动力。

4.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角度来说，焦点在于供给侧。也就是说，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成员的需要已从追求“有”和“足”，转向了追求“美”与“好”。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质上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从根本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不断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主线，改变和提升产品供给质量，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建在缥缈的空中，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让经济脱实向虚，而是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以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为支撑，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客观要求，只有从战略高度明确历史方位，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可持续的现代经济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

来源：爱思想网(2022-10-01)

作者：李晓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等等)

当我们在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除了因为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外，我们还应该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对市场经济给予肯定的评价。从模糊的感觉出发，大家会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广泛性，人人平等参加，人人都在自由地进行选择，这与其他经济运行似乎有区别。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分析这种感觉，看它是否有道理或仅是一种错觉。本文标题已点出了我的一个结论，这就是，我把这种感觉概括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

一、什么是“人民性”？

(一)从“人民”到“人民性”

毛泽东给人民下的定义是：“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这个定义比较清楚。我们认为，“人民”这个概念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应当按法律来判定。因此，我们认为，在古代社会，以民为其身份的所有人的总称为“人民”。近代社会中，人民是宪法所认定的公民的总称，由于宪法有时期性和地区性，因此，“人民”的范围也与时期、地域有关。

“人民性”到底是什么？“人民性”不是说人民的“性格”或“性质”，而是着重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其第一层含义是，当一种经济制度是按大多数人的意愿来创造的，是由大多数人建立或促成的，这种经济制度就具有了人民性。第二层含义是，当一种社会制度能使人民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幸福，使社会成员都具有追求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都享有自我选定交换方式的自由，这就是具有人民性的社会制度。在此条件下，人民能自主、自立、自强，能去做自己认为要做的事，而不是去做别人让做的事。

从广义角度讲，“人民性”就是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和主人，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二)“人民性”与“为人民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

“人民性”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表现是有区别的。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指出：“古典的民主学说中有两个假定，一是认为人民的幸福是共同的、一致的，二是假定功利可以满足人民的幸福”。从这两个假定中，可以推出一条逻辑，人民可以选出代表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同时，可以由他人通过功利使人民都获得幸福。显然，这给“为人民性”提供了论据。但是，这两个假定是有缺陷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及其满足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在政治领域中，人们不得不通过代言人代表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经济领域，尤其是个人消费领域中，别人是无法代表自己的。而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中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的人民性与古典民主论不同，它认为每个人的需求和满足方式是不同的，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每个人的幸福的满足，主要是靠自由交换取得的，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计划经济是以“人民性”的捍卫者身份出现的。但在实际上，计划者在保卫“共同的幸福”的时候，却否认了个人特殊的幸福，否认个人自由选择的消费权，因而，反而损害了个人的幸福。更进一步讲，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经济思想，认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靠计划部门的优良的计划来总体安排，生产、消费都可由一部分社会上的精英来计划。这些精英是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有比群众高的智慧和才干，因而，能把众人之事办好。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为人民性”，尽管其动机是高尚的，效果却是低下的。在经济领域中，“为人民性”并没有成为“人民性”，反而因忽视个性、过度强调共性而异化为非人民性。

市场经济的人民性，是指其自身具有的“人民性”。在这里，人民是真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自由地有时也是痛苦地选择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主人。尽管市场经济中人民性经常受到“资本”力量的干扰，但“人民资本”或说“人力资本”的出现和地位的提高，使人民性顽强地表现出来。

二、市场经济具有最大的人民性

市场经济具有人民性，这是相比较而言的。任何一种经济，都是以人民作为其中的主体来运行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中，人民总是生产力的主体，总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主力。当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少数的奴隶主和地主，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源，他们限制了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限制了大多数人对分配和消费方式的选择。因此，人民性受到了压抑和扭曲。但即便如此，在其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也体现出了人民性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民性的体现就更为突出。总之，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只要存在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中的人民性就比别的经济形态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强烈。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观察市场经济中“人民性”突出的原因。

（一）参与市场交换活动的普遍性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与自给自足不同的商品经济。人民的需求是广泛的、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同时满足千百万人的各类需求。但市场却每日每时地在满足人民的需求。如何满足呢？就是通过市场的交换，把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别人，同时从别人处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交换活动的广度具有明显的普遍性。一是商品的范围广泛；二是在交换中按价值规律办事；三是参与市场交换的主体更为广泛。

（二）选择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自由度更高

市场经济中，人们对生活的选择权和消费自主权得到较充分的发挥。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无自主权的，是被奴隶主来安排的；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选择只有极小的自由，地主以及土地资源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基本方面；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选择也是极为有限的，资本家和机器决定了工人生活和消费的主要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和消费选择也是有限的，由计划者来决定居住地点和条件，决定可供消费的主要物品，等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大众，生活地点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可以自由选择，消费方式具有充分自主权利。强迫人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生活或消费，是违反宪法的，是侵犯人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干预最少，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自主权体现在贸易自由和自愿上，体现在就业和迁徙自由上，体现在对私人生活隐私权的保护上，体现在以货币经济体现出来的一切平等上。

（三）参与生产活动的自主

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人民参与生产活动是有不同的限制的。不要说奴隶不能自由地从事生产活动,在计划经济下,群众也不能自主地参与生产活动——对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是限制的,对雇工人数是限制的,对产品品种和数量是限制的,对把发明变为产品的所有环节都是限制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参与生产活动是有完全的自主权的——人民有开办企业的自主权,有经营企业的自主权,有开拓市场的自主权,有进出口贸易的自主权,有选择银行的自主权,有购买证券的自主权。总之,人民可以在自己愿意的领域中去投资、去创业、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下的产权明晰原则使人民的财产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是人民参与生产最重要的条件

(四)制定规则的首创精神

在所有经济形态中,只有市场经济中的规则是最具有人民性的。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最广泛的参与者共同来生产、交换、消费,这样大家才能有共同发展的机会。但是,大家都来干,就会出现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矛盾,要靠平等地谈判,靠力量的均衡。而这一切,取决于人民。因为,只有协调好各种矛盾,才能使大家都生存和发展下去。这里的协调,就是产生规则的过程。市场经济中大量的法规,最初并不是少数官员或学者根据某种理论来创造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利益协调的要求来规定的。但在非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规则主要产生于官员与计划者。

三、大社会与小政府:对“市场经济人民性”的新注释

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或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政府无所不管,人民没有经济自主权,就谈不上人民性;政府放任不管,各种矛盾与冲突无人去协调,各种秩序无人去维护,也不能保证经济的人民性。在这里,有一个如何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大社会与小政府,这可能是对人民性一种较好的体现。这就是说,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集权政府,既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无组织的群众。这里是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是尊重社会的政府。人民性得到了发挥,同时,无政府的混乱又得以防止。

我国海南省实行了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政策,这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其经济中的主要政策就是,多种所有制千等竞争,以市场调节为主。早在1988年海南省党代会和人代会第一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海南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搞市场经济与小政府有无必然联系?与大社会有无必然联系?大政府能否搞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论指出:“在海南,任何人在讨论‘小政府、大社会’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讨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很难指望一个对‘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人,会真心实意地赞成‘小政府、大社会’”。[2]为什么呢?因为小政府与市场经济是紧密相关的,大社会也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信人民的组织能力,相信人民在投资和交易中的首要作用,相信人民自己在组织市场和发展市场方面的不可取代的地位,相信人民天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换言之,也是相信政府不可能也不必要包揽经济发展的所有职责,不必要也不可能去人为地制造一个“虚拟的市场及模拟的市场价格”,不必要也不可能代替人民去制定消费计划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切,更进一步讲,就是基于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人民性的本质属性。

“大社会、小政府”这个方针,说到底就是相信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能够自己组织好经济活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由海南经验引发了人们的思索。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如何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

四、市场经济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性是什么关系?

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各有自己的空间。前者主要是政治问题，或说是政体问题，后者主要是经济问题。前者包括社会主义如何产生政府及其领导人这个问题，后者则论述的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民(企业、个人)，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问题。民主政体触角不应伸得太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人民性。

如果以上的判断可以成立的话，社会主义的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人民性进一步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诉诸更多的理智，后者则为人民的生活需要所自发形成。大多数人在政治和经济的重大领域中，并不总是专家，而往往会受外界的影响，往往用感性代替理性。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各个历史阶段上，人民从解决近期利益出发，是不自觉地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人民性不足的时候，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加以启发与弥补。这里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民主性的互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会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有助于人民自觉地发挥创造性。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人民性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民主进程，也会有助于推进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

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政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对此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熊彼特认为：“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他说：“按某种意义说，民主程序的现代形式和现代机构，正像民主本身的基本原则一样，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和问题的自然结果。但这不能成为它们应该和资本主义一起消失的理由。大选、政党、议会、内阁和总理仍然可以证明是处理社会主义秩序可能保留下来以便作出政治决定的议事日程的最方便的工具。这种议事日程中将免除所有现时因私人利益冲突和调节私人利益的必要性而引起的项目。”

民主政体与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并不是一个东西，有时一致，有时也可能不一致。非民主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并不总是相对立的。有时，政府过多干预有损市场经济人民性，有时，民主也使政府的行政效率受损。但当政府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并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时，市场经济人民性就得到更大发展。改革中，有人希望政府处于一种低效状态，以减少干预能力，但低效的管理不利市场发展的后果与政府过多干预是一样的。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彻底的政治民主应建立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普及的教育程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础条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经济都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才能顺利开展，民主政体才能一步步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在本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提出的新纲领、新理论的集中体现。其理论上的新特点在于，首先，强调了议会多党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并认为民主就是目的，而不是斗争的一种手段，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后将抛弃的东西。其次，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如“公共监督”的种种形式，可以达到公有化想要达到的公平分配的目的，可以通过国家控股达到经济社会化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要限制扩大公有经济的比重，只在有碍公共利益的大企业中才考虑公有化，而且要发挥私有经济的合法的、必要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混合经济，部分是公有经济，部分是私有经济。社会民主党还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定为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正义、平等、废除特权，等等。[3]显然，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人民性相结合的，但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的设计，却不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当前的任务。

五、讨论市场经济人民性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此时讨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绝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有很强的现实性的。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告诉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把由上而下的改革变成上下结合的改革，要允许探索，允许创新，要时时注意保护人民

的利益。

市场经济人民性的意义，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 正确认识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规范化与人民性的关系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新生的市场经济的规范化要求与尊重市场经济的人民性要求是一致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没有先圣先哲事先圈定出的一套规则可用，因此，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大胆前进、小心探路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差错，会走一些弯路。换言之，破旧立新中出现的新经济系统，往往是不够规范的，是需要不断调整的。如果我们不提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经济改革就会长期在缺乏法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成果就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在承认和尊重市场经济人民性的基础上搞规范化，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就会成为少数人闭门造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只“车”，只有上下结合才能造得出来。

解决好市场经济人民性与规范化的矛盾在当前具有重大意义。1992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改革的新高潮，人民意气风发地创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多年来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如股票、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都从下而上地搞了起来，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多的新问题，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不规范的问题。如何看待形势，如何对待群众，成为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有必要强调把市场经济人民性与规范化相结合，既要保护人民进行改革的可贵热情，又要不断把自发产生的事物纳入法制轨道。纠偏而不是压制，整顿秩序不是否定改革方向，这里要求把握好二者关系，掌握好政策的分寸，要求多一些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

解决好二者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市场经济的最伟大的创造者是人民，人民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推进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规范化是在人民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不断升华了人民的创造，巩固了人民改革的成果。二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中相互作用和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二者“磨合”过程的结束，将意味着新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二) 关于经济改革中人民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在当前经济改革中，我们要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让人民在改革中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要使40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即全民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国有资产损失、流失或被少数人侵占，都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这一点，我们认为将计划经济中的“为人民性”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的重要方面。

为此，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一是在国有资产股份化改革中，要防止把国有股份压低，防止少数人把全民的财产化为己有。国有企业发展到今天，其资产是由全国人民的投资发展起来的，是由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创造出来的。国家控股代表着全民的利益，而且，国家股今后也将通过一定的形式受到人民的监督。国家土地也是全民的财产，不能划为各地政府的财产。出让国家土地必须价格合理，通过协议方式的低价转让土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其次，我们要反对把权力转化为资本。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些手中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趁机以权谋私，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金钱。通过权力攫取金钱是有损人民利益的。因为，权钱交换给少数人提供了优惠，造成了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不平等，甚至造成对法律的破坏；同时掌握权力的人之间产生极大矛盾，少数违法违纪者大发横财，忠于职守的人却清贫如洗，这就会瓦解权力的合法基

础，最后导致权力由腐败走向崩溃。权钱交易双方都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是以多数人收入减少为代价的，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

有些人认为发国家财的少数暴发户虽然是从国家墙上“搬砖”，但个人消费总是有限的，毕竟会为国家做贡献，而这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原始积累”过程。有些人甚至公然讲，通过金钱买下执政党，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也是最优选择。我们认为，这些损害了人民利益的理论，是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如果市场经济就是以损害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制度，我们就宁肯不要这种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具有“人民性”的，“反人民性”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而是少数人为谋取私利的理论“黑旗”。

（三）“主人公”地位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劳动人民主体的工人、农民地位是否在下降，市场经济中的“人民性”是否主要是交换与消费领域中的自主权，而不是生产领域中的“人民性”？非也。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将定位在合理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中对工人、农民的地位名抬实贬，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按工人、农民在生产中的作用，而不是从革命的政治的角度来给予评价，才能真正体现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其次，工人与农民在交换与消费领域中的自主权的大大增加，这也是肯定的。但在生产领域中，工人、农民的自主权也并没有失去其应有地位。中国农民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生产自主权，这是事实。工人阶级通过企业改革，有了对工作选择的相对自由，有了竞选担任企业领导的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股份，有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使自己更能“凭本事吃饭”，这一切，都说明工人在生产中有了更多的权利。

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在搞市场经济中，工人阶级地位要下降，是针对知识分子和企业领导人的地位上升而提出来的。但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本来就不是对立的范畴，姑且不说政策规定“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工人本来可以通过学习成为知识分子，工人由劳力者成为劳心者，或说成为“白领”，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我们通过努力要尽快实现的。至于说，企业领导作为企业家阶层，也属于工人阶级的大范畴。尽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经常发生矛盾，但从阶级属性上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极为有害的。除了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工人不应如此划分，即使是私营企业，劳资之间也不仅是利益的冲突，更有共同创造企业财富和社会财富的一面。过去，我们否认了这一条，结果，使生产力长期落后不前，这个教训应吸取。当然，国家有责任来解决劳资矛盾，有责任保护工人，因为，我们绝不否认资本对劳动存在剥削的一面。

自评《论市场经济的人民性》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经济改革走向了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公认是政府主导性，但是，人民在创造新经济体制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近几年，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人民的创造性与政府规范化之间的矛盾，这是引发本文的最初动机。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是人民自己创造的经济，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广泛民主性，是合理的体制；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主导改革时，要尊重人民对新经济体制的创造。同时，文中也表露出对公有财产重新分配中出现的不公平问题的担忧。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深意与挑战

来源：爱思想网(2022-10-10)

作者：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指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及主要目标,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一直在进行,而统一大市场建设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早在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2015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要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延续了以往的要素市场改革,也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当前形势来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紊乱,对全球的企业与消费者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少国家更加依赖国内生产和流通。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加大对我国的贸易打压,外部环境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举措,通过内部确定性和高水平的经济循环来抵御外部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市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虽然我国的市场规模优势十分明显,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国际局势和疫情影响,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仍存在不少挑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人口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0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但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打破阻碍各种要素资源流动的障碍,保证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至关重要。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意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定要使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顺利流动,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与制度壁垒,疏通阻碍经济循环的各种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区域或省市内的小循环。当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更加畅通,市场运行的效率与规模必将不断提高与扩大,实现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同时在实现高质量国内循环的基础上,与国际市场相结合,进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依托。2022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为干扰,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走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将市场需求转移到国内,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未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增加,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将愈发明显。当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不是在我国实现“闭环”发展,而是以我国的超大市场规模与未来发展潜力,吸引全球的优质生产要素与高质量外资主动流入我国,提高国内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水平。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利

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利于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商品和要素市场顺畅流通的关键。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决定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的引导性力量，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当前，市场垄断与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破除阻碍要素畅通流动的隐形市场壁垒，盘活生产要素资源，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实现畅通流动，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分工与合作。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激发我国的市场潜力。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实现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条件。同时，我国拥有十四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断扩大，消费潜力十分可观。202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4%，规模再创新高、质量稳步提升，对优质外来投资有着强大吸引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利于解决要素流通壁垒，刺激各种要素资源活力与发展动力，吸引各种要素跨境自由流通，在国内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经济发展活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在保证关键要素顺畅流通的基础上，实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规模市场内流通汇聚，吸引技术、人才、创新等优质要素，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转型，创造国际合作新优势。

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与过度干预现象。有研究发现，当清除地方保护以及市场壁垒后，一定规模以上的国有和非国有制造业部门的产值将会增加。地方保护与区域壁垒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个别地方的锦标赛模式。过去四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都维持着高速增长，并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一些地方过度追求GDP等经济指标，更倾向于投资建设时间短、收益见效快的短期项目。同时，锦标赛模式还会导致不正当竞争，造成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扭曲的条块分割，阻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部分地区出现“小而全”式的自我小循环。

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各种制度性壁垒会分割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以劳动力为例，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当前劳动力的流动还面临不小阻碍，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等。同样，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流通也有不少堵点，地方管理制度的差异会造成要素市场的条块分割，进而阻碍核心技术进步与产业模式的创新。

市场准入歧视与产权交易壁垒。个别地方出于本位主义，在制定市场准入与招标门槛时，会对外地企业划定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变相保护本地企业；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项目存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市场准入歧视；在税收优惠与减免等补贴政策的制定上，个别地方针对本地企业与投资商出台各种要素资源优惠政策；出台特殊限制政策、法规与标准，限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一定程度上产生不同地区间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壁垒。这些做法不仅会助长企业寻租腐败行为的产生，同时也会破坏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不仅打击市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也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这些都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市场监管标准与程序的统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监管规则的规范化、标准化仍有提升空间，不同区域的市场监管规范、规则等尚未完全一致，尤其是跨区域的监管执行与程序体系仍未完善，多部门共同监管造成的监管重合与分割难以协调。与此同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技术交易与信息共享，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监管难题，“互联网+服务”、在线培训等新兴业态的市场监管仍然存在监管漏洞与技术隐患。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战略性系统工程

改善激励约束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必须先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这一关键障碍，在宏观上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发展目标与地方政府微观的绩效考核体系相结合，促使地方政府找准自身定位。利用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实现商品、资本、技术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通，破除地方保护与交易壁垒，让供给和需求有效结合，保证各种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完善统一市场监管规则，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统一市场规则的建立，是实现公平竞争和破除交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市场监管法律规章、市场监管标准比较齐全完备，市场监管立法不断完善。各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线上教育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涌现亟需制定标准化的市场监管规则，运用线上线下共同监管的方式，避免出现监管漏洞。同时，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监管的体制机制，在制定统一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实现跨区域联动，实现部门信息数据共享与联合监管，灵活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型监管方式，最终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治、大众监督的多主体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

建立健全统一商品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这就需要对商品以及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等要素进行制度改革，其中统一要素市场是关键。应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规范资本市场准入管理，缓解资本市场条块分割问题，实现资本要素的顺利流动。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困难与技术市场封锁等难题，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技术交易市场，制定激励机制，鼓励不同区域的技术成果交流互动与开放共享，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针对数据市场，当前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对于我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与互联网新业态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数据安全、数据共享以及数据要素互通共享方面的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等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深度开发利用数据资源。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高质量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基础，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在全社会建设统一的社会信用基础标准，充分发挥高质量社会信用体系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打通信息壁垒的作用。同时，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市场信用监管相结合，创新市场监管机制，形成覆盖所有市场主体的高质量社会信用体系。将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有效结合，激励守信行为，惩罚失信行为，规范交易市场秩序，在全社会创造良好信用氛围，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新闻快讯

“培、稳、优”三策齐发 为市场主体解忧添力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09-27）

作者：班娟娟, 刘宏宇, 魏一骏, 余贤红

1.5亿户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底气所在。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培育市场主体；扩大有效需求，稳住市场主体；优化发展环境，培优市场主体……近段时间，多地多部门围绕促进市场主体发展多维发力，将短期纾困与长期减负相结合，将扩大有效需求与增强内生动力相结合，为市场主体解忧添力，更好稳住经济基本盘。

“培”：让市场主体“进得来”“生得快”

8 月，海南省新增市场主体 68314 户，同比增长 63.63%。其中，企业 16601 户，同比增长 18.23%；陕西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8.09 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 2.5 万户，同比增长 33.45%；截至 8 月底，甘肃省累计有市场主体 213.07 万户，同比增长 8.5%……今年以来，多地多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场主体保持稳步增长。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激活力；加力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拓展就业空间，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和经济新动能；对市场主体，实现企业开办、企业准营、员工录用、涉企不动产登记、企业简易注销 5 项政务服务一次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将培育市场主体作为重要议题。

在北京，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实现更多市场主体“准入即准营”；在江西，构建全省统一的“线上一网、线下一窗”惠企政策兑现“直通车”，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共设置 200 余个惠企政策兑现窗口……不少地方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将短期纾困与长期减负相结合，让更多市场主体蓬勃生长。

“4300 万元退税，从申报到账仅用了 2 天时间。”江西弘信柔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钱小进说，这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科技型企业来说，极大地缓解了资金压力，更坚定了企业发展信心，目前公司一期项目已投产，年产值预计可达 20 亿元。

下一步，如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降门槛、减负担、稳预期成为破题关键。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文明确，进一步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推动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进一步优化涉企服务，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进一步加强公正监管，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

“稳”：让市场主体“有订单”“有收入”

9 月 21 日，MU7101 航班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出发，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宁波市商务局贸促处处长费建明表示，这次的第二批第二趟一共搭载了 136 名外贸从业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相比 7 月 10 日发出的首批首趟整整多了 100 人，比起第二批第一趟的 75 人，将近翻了一番。

无独有偶。为助力佛山外贸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自今年 8 月起，广东省佛山市开展“佛货全球优展”系列活动，组织企业参加境外线上及线下展会。“展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企业年出口额超过 11 亿元。”广亚铝业有限公司出口销售副总经理饶继光说，企业要积极转变思维，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加快步伐“走出去”。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也是市场主体面临的突出难题。让更多外贸企业走出去，让消费更有活力，让投资马力更足……眼下，多地多部门在扩大有效需求上持续深耕，让市场主体有订单、有收入，助力市场主体真正“稳”得住。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源头活水。扩大有效需求是稳住市场主体的根本所在。政府在扩大有效需求上积极作为，通过带动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可以有效化解需求不足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

“优”：让市场主体“长得好”“动力足”

不仅要让市场主体“生得快”“稳得住”，还要让市场主体“长得好”“有前景”。

近日，宁波德业集团下属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行北仑分行发放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2 亿元。公司负责人介绍，依托光伏行业的市场发展，近年来企业销售与生产规模稳步扩大，对资金投入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有关部门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为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开拓市场注入了动力。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自主知识产权高新科技企业。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上海市复工复产“白名单”企业，虽然此前曾停产两个月，但今年仍有望实现 2.5 亿元的销售额，超过历年水平。目前公司将营业收入的 10% 以上投入研发，力争在细分领域做到最优。

“真金白银”支持企业转型和创新发展；持续推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内部管理效能……不少地方正将纾困减负举措与增强企业内生动力相结合，为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注入源源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晓白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针对市场主体面临的市场需求不足、经营效益不佳、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新一轮促市场主体发展举措更加注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力；更加注重降本增效，助力企业提高经营效益；更加注重优化创新制度环境，调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注重开拓外部市场，提升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在马晓白看来，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全面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等各项纾困政策，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切实帮助解决市场主体发展难题，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问题。同时强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稳住企业，促使其焕发勃勃生机。

刘兴国认为，不仅要做好短期纾困，更要着眼于解决企业长期发展问题。比如，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鼓励企业增强创新意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创新能力，推进转型升级和构建竞争新优势。

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中国“脱钩”完全错误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2-10-13)

责编：刁炜

参考消息网 10 月 13 日报道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10 月 11 日报道，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11 日向中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朔尔茨在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于柏林组织的会议上表示反对所谓的“脱钩”。“‘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这位德国社民党政治家表示，“当务之急——或者说转折时期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脱钩’，而是聪明的政治与经济多样化。”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和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都表示反对欧洲企业退出中国市场。

东布罗夫斯基在会上说：“对我们的企业而言，与中国‘脱钩’不是一个选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市场，是我们支付得起的初级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他还说：“我呼吁各位将重点放在多样化和优化风险管理上。”他表示欧盟将以务实成熟的态度来发展对华关系。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卡尔·霍伊斯根也支持这一观点。霍伊斯根认为，中国是机械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市场，但也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对手。

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 10 月 11 日报道，德国机械制造商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对于这一德国旗舰产业而言，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场。德国机械制造商目前也获得了大力支持：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都在柏林机械工程峰会上反对德国和欧洲企业与中国市场“脱钩”。

朔尔茨强调：“‘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他说，德国以及欧盟必须建立更广泛、更牢靠的贸易关系。“我们必须和许多国家进行贸易，包括中国，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

朔尔茨于是受到了机械制造商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个行业对开放市场的依赖程度几乎比其他所有行业都高，出口占比高达 80%。即便在当前危机中，海外业务也表现得相对稳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维歇斯表示：“我们在国外没有发现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8 月的海外订单增加了 2%，来自国内客户的订单却减少了 6%。”

又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表示支持全球化并称“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时表示，中方积极评价欧方有关表态，中国也支持全球化，反对“脱钩”。

发言人指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背景下，坚持开放合作，增强经贸联系，不仅有利于中欧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和欧盟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合作互利共赢。去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 8000 亿美元，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了 2700 亿美元。今年 1 至 8 月，中欧贸易总额为 57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8%。欧盟对华投资 7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5%。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中国排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09-30）

作者：汪子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当地时间 9 月 29 日发布《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结果显示，中国排名第 11，较去年再上升 1 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 36 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

报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设置政策环境、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 7 个大类 81 项细分指标，对全球 132 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排名。

中国在报告中 9 项细分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创新投入方面，国内市场规模，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阅读、数学和科学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量表等 3 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一，国内产业多元化、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等 2 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二，全球研发公司前三位平均支出、高校排名前三位平均分、资本形成总额 GDP 占比、企业供资 GERD（研发支出总额）占比等 4 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三。创新产出方面，本国人专利申请量、本国人实用新型申请量、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本国人商标申请量、劳动力产值增长、创意产品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 6 个细分指标排名第一。

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方面，2021 年，中国品牌总价值达 1.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全球排名第 18，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在全球银行业排名第一，华为在全球科技行业排名第二；风险投资规模达 9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全球排名第 16。2020 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达 7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全球排名第四；高科技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 48.1%，较 2018 年增长 1 个百分点，全球排名第 14；知识产权收入达 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世界 5 大科技集群中中国独占两席。报告显示，东京—横滨地区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集群，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北京、首尔、圣何塞—旧金山地区分列第二至第五位。

俄媒：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生活质量 进一步提高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2-10-13)

责编：刁炜

参考消息网 10 月 13 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社 10 月 11 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指出，中国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 2012 年的 33.0% 下降至 2021 年的 29.8%，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报告称，2021 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7178 元，比 2012 年增长 80.2%，年均增长 6.8%。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33.0% 下降至 2021 年的 29.8%，下降 3.2 个百分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据报告，2021 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100 元，比 2012 年的 12054 元增加 12046 元，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名义增长 99.9%，年均名义增长 8.0%，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实际增长 67.4%，年均实际增长 5.9%。报告称，中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报告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力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各项措施接续发力，居民分享到更多经济社会发展红利，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报告说，2021 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 元，比 2012 年的 16510 元增加 18618 元，累计名义增长 112.8%，年均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实际增长 78.0%，年均实际增长 6.6%。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13 年至 2021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5 个百分点。

外媒述评：二十大将描绘中国发展路线图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2-10-16)

责编：刘天霖

参考消息网 10 月 16 日报道 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 10 月 13 日发表题为《中共二十大将为未来设定路线图》的文章，作者是斯蒂芬·恩代格瓦。文章摘编如下：

在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挑战之际，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将是提出中共在未来五年及以后的路线图，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中共二十大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中共正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在 2021 年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中共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鉴于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开放的新环境以及不断增加的外部风险和挑战，中共也强调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必要性。

中共无疑将在二十大后继续引领中国人民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为其他国家选择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样板。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国的和平崛起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在全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国家转变为全球增长引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许多伙伴都是双边亲密伙伴关系的受益者，它们期待在未来几年取得更大的成就和繁荣。

中共一贯强调保持忧患意识，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并努力以正确的战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专家们说，今后五年，在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向，以维护国家安全，同时继续促进发展。

在新冠疫情等挑战带来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竞争造成分歧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预计中国共产党将重申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作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的一部分。

这两项倡议被普遍视为中国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面临问题的方案。自提出以来，全球发展倡议一直被定位为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全面催化剂。

这项倡议对处于困境中的世界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旷日持久的冲突、气候影响、蔓延的贫困和广泛的资源短缺有可能使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并对许多国家的发展潜力产生不利影响。

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明年不乐观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2-10-07)

责编：刁炜

参考消息网 10 月 7 日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10 月 5 日报道，一项最新预测显示，在能源价格高企、利率上升以及战争引起的混乱的重压之下，明年世界贸易将急剧放缓，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周三说，2023 年全球商品进出口总额可能仅增长 1%，低于此前预测的 3.4% 以及今年 3.5% 的增长预期。

世贸组织还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预测的 3.3% 下调至 2.3%，并发出警告称，如果各国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纷纷大幅加息，经济增长放缓的幅度甚至会更大。

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危机，2023 年经济形势黯然失色。”

如果把商品与服务（如旅游业、教育和医疗）都计算在内，8 月份美国出口总额环比下降 0.3%，而进口减少 1.1%。由于进口跌幅超过了出口跌幅，因此上个月美国贸易赤字缩减了 4.3%。美元坚挺为美国消费者降低了进口产品价格，而美国产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则变得更贵了。

美国能源公司今年来受益于价格上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也因为俄乌冲突引起的贸易混乱而有所增加。

8 月份，随着需求放缓，而且价格比初夏有所下降，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但石油出口下降，石油进口增加。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其以俄罗斯为首的盟友周三一致同意将石油日产量削减 200 万桶，此举可能给能源价格造成上行压力。消息传出后，石油价格应声上扬，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2%，至每桶 93.90 美元。

报道称，欧佩克的决定还有可能破坏七国集团富裕国家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行动。这是西方对莫斯科开展经济战的重要措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周二说，6 月至 8 月，二十国集团各大经济体的年化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9.2%。

世贸组织说，贸易放缓可能进一步改善供应链，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缓和价格压力。

4 月至 8 月，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编制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在逐月下降。

最近几个月，全球运费迅速下降。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松德在客户须知中写道：“这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商品需求一直在放缓。”

亚洲地区采购经理指数显示，9 月份亚洲大部分地区制造业出厂价格出现了自 2020 年年中以来的首次下降。香港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弗雷德·诺伊曼说，这个迹象表明贸易增长放缓可部分缓解通货膨胀。

报道称，美联储及其他央行都在大幅加息，试图通过限制招聘、开支与投资，来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这些举措加剧了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消费需求和经济活动放缓。一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担心，加息幅度可能超过需要的水平，引起经济衰退。

奥孔乔-伊维拉女士说：“存在可能做过头的风险。”

2020 年年底，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导致的混乱中复苏，商品需求暴增，这刺激了 2021 年贸易量暴涨。

报道还称，现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大量迹象表明全球贸易在放缓。

9 月份，韩国出口按年率计算增长 2.8%，为 2020 年 10 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欧盟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欧洲对克里姆林宫实施制裁，对俄出口暴跌。但是，欧洲对美国出口迅速增长。

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经济学家马修·马丁与凯茜·博什蒂安契奇称，美国周三公布的贸易报告“再次证实了随着需求疲软、企业收缩投资，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